（热点话题）

稿酬问题

□文／魏雅华

导言

稿酬问题眼下变得如此尖锐，变得非得展开一场大讨论不可，因为它已经变得与我们目前这个商品社会和商品时代如此不协调，严重地影响到一个如此重要的社会阶层的生存问题。

在这件事上，人们并未象在别的事情上一样，等红头文件。而是悄悄地，却相当积极地动作着。1990年由国家版权局所颁布的“书籍稿酬暂行办法”还在“暂行”着，便已不那么管用了。至少已有一大半被摈弃了。它的修订亟待进行。

积重难返的后遗症

我国的稿酬制度建国四十多年来，曾多次修订，大起大伏。50年代初，我国仿效苏联，原则上根据“著作物”的性质、质量、字数及印数计酬，并参考苏联按版次计酬的办法，但付酬的标准仅为苏联的五分之一。尽管那时我国实行的就是低工资、低稿酬、低消费的制度，但这个标准仍能使著作人获得较可观的收入。（当然，那时中国一年只出几部，甚至几年才出几部长篇小说，这便使每部长篇小说问世都有相当大的印数）。

□刊头设计／董凤山

□本版编辑／周　矢

从1958年到1965年，“反右”斗争后，批判了“资产阶级法权”，对“知识产权”和“著作权”几乎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和否定。于是，国家制定了统一的稿酬制度，一律按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计酬。后来，又将本来就很低的付酬标准一降再降，又索性取消了印数稿酬。

1966年后，这种极左思潮达到了顶点，完全取消了稿酬，甚至为了批判资产阶级名利思想，连文章的署名也一并取消。或是署以××写作组集体创作，出现了确属“空前绝后”可笑可悲荒唐荒诞的大闹剧。

1977年后，国家尽管恢复了稿酬制度，但只是象征性的付一点酬。1980年5月，中宣部以[1980]14号文件，转发了国家出版局制订的《关于书籍稿酬的暂行规定》，将1977年的“补贴”标准，从每千字2至7元提高到3至10元。1984年提高到6至20元。1990年，国家版权局颁布了“文革”后的第4个“书籍稿酬暂行规定”，著作稿酬从每千字6至20元提高到每千字10到30元。而这个标准也才刚刚恢复到50年代初的水平，可时光却不会倒流，90年代的物价已是50年代初的10倍！也就是说，现在提高了4次的稿酬，也只是50年代初的十分之一！

这种低稿酬导致了中国稿酬与国际稿酬的巨大反差。世界上，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是不养作家的。可话又说回来，如果稿酬制度合乎市场规律，符合其商品价值，又何须谁来养？

中国的作家为什么穷？是他们不勤奋，还是他们智商低？

国外的出版商在千方百计地，或他们亲自上门，或委托代理人上门索搞，由于中国搞酬极低，他们的开价便乘虚而入，一等作品，三等价格，就这也3至5万美金不等。而这个数字，对嗷嗷待哺的大陆作家，已是一夜暴富的天文数字了。

这种畸形的低稿酬制度造成了一系列的恶果。谁都知道，一部书的质量，基本上是由文稿的质量决定的。但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书的成本（硬件）出厂价只是书价的百分之二十七，而作者的劳动只得到书的价值的百分之三——百分之四，出版社所得为百分之五左右，其余利润均被书商或书店所得！流通环节竟拿走了书籍收费的百分之六十！

这就是富书商与穷作家的奥秘。

写书的不如卖书的。

作家的地位不如书商的地位。

作家的贫穷已经到了啼饥号寒，需要乞求施舍的程度。

国家一级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路遥，英年早逝，他患病期间，医药费无处可报，由省委宣传部特批专款报销，死后清点其财产，存款刚够还债，其资产为零。

路遥一生勤奋多产，生活节俭刻苦，然清贫如此！

而陕西的另一位国家一级作家邹志安，死后《文学报》发起为其募捐，以救济其遗属。作家的贫寒，令人痛心疾首！

这些文坛骄子，尚且如此，其它文化人的穷苦，可想而知。难怪文化人有穷途末路之感。弃文从商者众，另谋生活去也！

该不该与国际“接轨”？

我国现行的稿费制度至今尚沿袭着“按劳分配”的基本指导思想，即按照支付的劳动付给报酬，付出的劳动多，则报酬多，反之，则少。在这个概念中，缺少了劳动的价值。尤其是对复杂劳动。

美国的稿酬标准从每个字0.5美分到7500美金，跨度150万倍，而我们的稿酬跨度只有2倍。劳动的质量何以体现？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上的巨大差异何以体现？

国际上最通行的稿酬标准是版税制，即按图书发行总价值的适当百分比付酬，最通行的为百分之十左右。如果中国也照此执行，何愁作家不富？

试举一例，笔者一篇文章有幸为一家《文摘》所转载，该刊发行每期320万份，每本定价1元，若按国际标准付酬，每期应支付32万元稿酬，则每千字稿酬应为4200元，笔者6千字的文章应得稿酬为2.52万元。而此后，此刊又出版了3种不同版本，故此文应得稿酬为7.56万元。何愁作者不富？而实际上笔者仅得搞酬120元。

此文还曾被另一家《文摘》刊物所转载，此家刊物发行量也不小，估计在20万份以上，却仅付酬30元。该刊来信说，他们的标准是每千字5元。而且也是依据红头文件的。

还有一家文摘刊物，转载了笔者一部6万字的作品，仅付酬180元，还说他们支付的是高稿酬。也是依据红头文件的。笔者一怒之下，郑重宣布与该刊断交，严禁该刊再转载笔者的作品。（每千字仅付酬3元。）

而现行的稿酬标准中的有些条款则更加让人弄不懂了，比如“对由汉文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对原著作者不付稿酬”，再如，“编选不同著译者的报刊文章合集出版，只付基本稿酬，不付印数搞酬”。“出版社约请多人撰写，单篇独立的合集，只付基本稿酬，不付印数稿酬。”这些规定，连其指导思想都让人莫明其妙。

印数稿酬过低甚至没有，导致书商肥而作家瘦，是对作家、著作权人的一种掠夺。实际上，印数是体现劳动价值最重要的参数，在每一本书中，都包含着著作权人的劳动，付酬当然是必须的。

前不久，报载南韩一位女作家因2部畅销书而成为亿万富婆，稿酬为总洋的10％，总发行量为100万册。若如此取酬，中国作家中至少有100个亿万富翁。

琼瑶一年也不过推出一两部长篇，三四十万字，何以年收入超过300万元港币？其大部分收入为重版稿酬。

若能如此，作家何须“下海”？何须“曾经沧海难为水”？作家莫非不创造财富？作家创造的财富哪里去了？

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印了160万册，每本书定价为5.90元，总洋高达896万元，据悉，稿酬为百分之六，她应得稿酬为53.76万元。

有人说，她成功不在曼哈顿，这是真的。

然而，版税制的付酬办法，尽管已被越来越多的出版社所接受，但至今并无立法依据。

面对商品大潮，不改也得改了。

进入1994年，旧的稿酬制度，不改也得改了。

当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在完成了温饱型向小康型的转化，生活的节奏变得越来越快时候，人们对文化生活的需要和消费层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报纸、杂志更加商品化。其竞争更加激烈，首先是各报竞相出版“周末版”、“月末版”以期增加印数、扩大市场，争夺读者。其次是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的各种期刊和小报，也加入了这个竞争的行列。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好稿、信息量大、题材重大、可读性强的稿件就必然成为炙手可热的俏货。加之各出版社亦不甘心眼睁睁地看着能带来巨大济效益的畅销书稿被到处狩猎、精明老练的书商们竭泽而渔，于是，便竞相加码提价，加入了争夺者的行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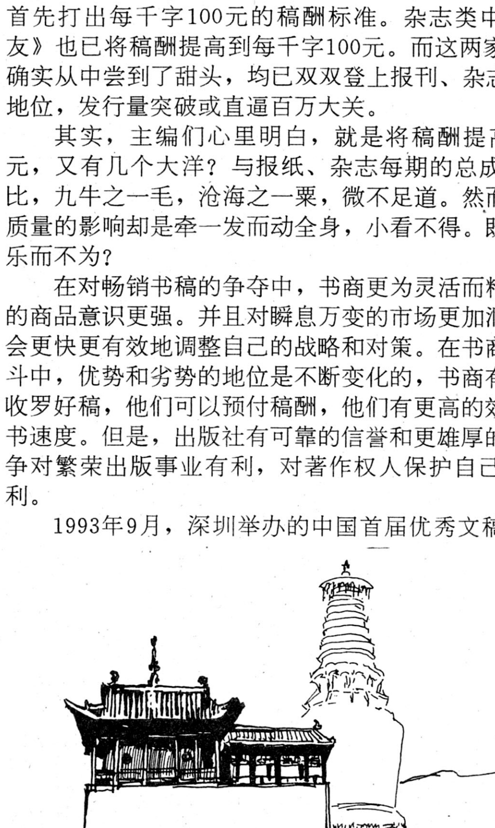
本版速写　陶炳林

然而，生产一篇好稿，谈何容易？好稿自有好稿的投资。一篇好稿，题材热门，信息量大的热点新闻，并非作者坐在家里，拍拍脑门，一杯浓茶，几枝香烟写得出来的。常常要作者踏破铁鞋，敲开一扇扇不开启的门，寻找一个个不回家的人，受尽从门里被赶出去，又从窗户里钻进去的热脸冷屁股的磨难，才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这样的稿，又一再浓缩，才成精品的，自然身价也高，岂是每千字二三十元打发得了的？

实际上，各报社、杂志社、出版社均已打破了1990年国家出版局的“暂行”标准。在报纸类中，广州的《南方周末》已首先打出每千字100元的稿酬标准。杂志类中，陕西的《女友》也已将稿酬提高到每千字100元。而这两家报刊、杂志也确实从中尝到了甜头，均已双双登上报刊、杂志中的超级大国地位，发行量突破或直逼百万大关。

其实，主编们心里明白，就是将稿酬提高到每千字200元，又有几个大洋？与报纸、杂志每期的总成本和总收益相比，九牛之一毛，沧海之一粟，微不足道。然而对报纸期刊的质量的影响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小看不得。既然如此，又何乐而不为？

在对畅销书稿的争夺中，书商更为灵活而精明，因为他们的商品意识更强。并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更加洞若观火，从而会更快更有效地调整自己的战略和对策。在书商与出版社的争斗中，优势和劣势的地位是不断变化的，书商有更精明的办法收罗好稿，他们可以预付稿酬，他们有更高的效率和更快的出书速度。但是，出版社有可靠的信誉和更雄厚的实力，这种竞争对繁荣出版事业有利，对著作权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有利。


塔院寺 1990年10·28

1993年9月，深圳举办的中国首届优秀文稿拍卖会，更是将书籍稿酬推向市场的重大步骤，是中国文化市场的一个大喜讯。

当内地的作家们还自命清高地在报刊上争论文稿是不是商品的时候，具有超前意识的深圳的拍卖会的重槌已在台面上敲响，并且极明快、极简洁，极响亮地为这场争论画上了句号。

尚需一提的是著作权人的个人所得税，尽管对此文化界反映强烈，文化界的人大代表一再提出意见，《文学报》也曾以头版地位报道了降低税率的消息，但税收部门的通知上仍毫不客气地按百分之二十征收！这个税率比个体工商户的税率还高出百分之三百！又是何道理？

个体户们早已视作家为“文丐”了，可税务局却视作家为“大款儿”。要不，何以得如此？若是税务局视作家为“文丐”，而个体户们视作家为“大款儿”，岂不善哉？

阿弥陀佛！

更新观念　刻不容缓

在稿酬问题上，有许多现象更加引人深思。

比如书刊的封面设计，按照出版社的规定，一个封面的稿酬只不过几十元而已。可“货卖一张皮”，这件事早已率先被书商们所认识，读者见到一本书或一本刊物，第一眼看见的是封面。尤其是在眼下的书报摊上，群芳斗艳，百花争辉，封面若不赢人，便难以得到读者第二眼了。

于是，书商们便打出了“一眼千金”的牌，设计一个封面，稿酬1000元。而有些刊物甚至悬尝采用封面一个，2000元稿酬。

这张牌一打出来，出现了几个效应。一是高手们趋之若鹜，二是出版社的美工们躺倒不干。于是，被商品规律所驱赶的总编们也只好无奈地接受这个事实：悬尝千金，寻求封面。这便是市场规律！它准确无误地显示劳动的价值。它不承认支付的劳动，只承认劳动所创造的价值。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出力的不挣钱，挣钱的不出力。

这原是体力劳动对脑力劳动的愤懑不平。但这是事实，是劳动价值对劳动报酬的一种效应。须知在市场规律中，起决定作用的并非支付的劳动数量，而出于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劳动质量。

复杂劳动怎么能与简单劳动等值？

是否一个人在一小时内创造1000元财富，与一个人在一小时内创造10元财富的人领取同样的报酬才算公平？

比如音乐家们，在知识产权上，他们更惨，一个产品走俏，可以100万、1000万装入实业家的口袋，一本书走红，著作权人亦可几千、几万元入帐，可作曲家们呢？“十五的月亮十六元”便是最生动的写照。

如果说，人们口头传唱是无法向词曲作家付酬的，那么许多明明是商品的生产厂家却也藐视词曲作家的权益。近几年来，许多音像出版社发了大财，聚敛了几百万、几千万的财富和资产，他们给歌星们一只歌可以高达数千元的报酬，而词曲作家却只付几十元，十几元，而且也是振振有词，有凭有据地说，这是国家规定的稿酬标准，他们取的还是上限，支付的是高稿酬！

而广播电台、电视台根本就不付酬，虽然他们每年几千万元，甚至几亿元地收入广告费，却说他们是“非赢利单位”，播出电视、广播节目是不向听众观众收费的。

关于这个问题，国外是早已解决了的。中国现在已经加入了国际版权公约，国际版权公约对此类问题早已有明文规定，只是中国人历来的惯性很大，于是，掉头和刹车便都很难。难也罢，只要努力便行。而且这个头总要由南方来带。最近，广东电视台便为几位著名的词曲作者一次付了一笔很可观的稿酬，算是个开头儿吧。即便如此，到底给了词曲作家们一个美好的梦。

希望这个进程快些，再快些。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在外地的陕西人

□文／郭洁

甫抵曼谷，诸事繁杂，既要跑公司注册，又要忙于业务衔接，还要选定新公司地址，无奈只得借一位朋友陈先生的闲置公寓小住。

这是一幢半圆形的15层公寓楼，位于石龙军路一侧，窗外不远处即是横穿曼谷市区的湄南河。凑巧我住的房子又位于顶层，每日忙碌一天，到得黄昏归来，冲个凉，坐在阳台竹椅上，近处浏览波光粼粼的湄南河，以及那穿梭于河上的拖船、游艇、轮渡；远处俯瞰一下市区的高楼、街区、庙宇，听听寺庙里悠悠的钟磬之声，倒也减去了不少的疲乏。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刚刚起床，便听到天空中响起了隆隆的雷声，继而乌云翻滚，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我急忙到阳台上收晾着的几件衬衫，忽然听见“哎哟”一声，只见斜对面一家阳台上有一位年轻姑娘失手将一件T恤衫掉了下去。她趴在扶拦上向下望了望，声音不大，但却十分清晰地说：“真倒霉！”

“中国人！”我有些诧异，待想仔细打量一番时，大雨已铺天盖地而至，我们忙各自回屋。

打这儿起，不知不觉地，我就有些留意这个同楼而居的“女同胞”。然而尽管住同一幢楼，出入同一个楼门，用同一部电梯，却一直没有机会见面，她仿佛整日呆在屋里不出门，抑或昼伏夜出，与我作息相反。只是偶而星期天在阳台上能见上她，而她似乎总是对着湄南河发呆，脸色阴郁，从未见过她那儿有什么别的人出现过。

1993年国庆节前夕，适逢周末，恰好贵州六盘水水泥厂的几位厂长朋友来泰国考察，洽谈业务，于是我便略备了些熟食、啤酒、饮料之类，在我15楼的公寓开了个小小的“国庆派对”。喝着“青岛啤酒”，吃着“梅林”罐头，听着韦唯、毛阿敏的歌子，不大的小屋里倒也洋溢着几分节日的气息。

酒席正酣，我到阳台上取餐巾纸，无意中发现“女同胞”正在对面痴痴地望着我们这个充满欢声笑语的窗口。——一定是这里久违了的乡音吸引了她。——我冲她笑笑，“小姐也是中国大陆来的？”

她惊喜而又怯怯地点点头，但马上又似乎意识到了什么禁忌一样，急忙进屋去了。

过了几天，这套公寓的主人陈先生约我在龙城花园吃饭，我终于忍不住向他问起这位“女同胞”。

“她啊，”陈先生蔑视地说，“还不是一只笼中的‘金丝雀’！”

见我一脸的困惑，陈先生吸了口烟，笑曰：“这种妞儿目下曼谷多的是，不是让人包起来做小妾，就是到歌厅当吧女。千里迢迢，背井离乡，把中国人的脸都丢尽了。”

“可我怎么觉得蛮清纯的。”我呐呐道。

“清纯？”陈先生在烟缸里捻灭烟蒂，“笑话！金屋藏娇，逢场作戏，寡廉鲜耻，不思进取，何来清纯！”

我默然，可又实在不愿相信他的话。

圣诞夜，我同几位泰国友人到素里翁路上的“嘉乐斯”歌舞厅消闲。一曲终了，主持人宣布由来自西湖之滨的兰小姐为大家献歌。继而一曲悠悠的曲子回荡在整个大厅里。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远方……”

我透过影影绰绰的舞蹈者看去，却原来是那个早已熟悉的面孔，那位毗邻而居却不曾相识的“女同胞”。只见她穿着开口极低的裙子，浓装艳抹的脸上淌着晶莹的泪水，如梦如痴地吟唱着，似乎心中有无限难言的隐衷。

歌毕，一位花甲之年、秃头短腿的男士走上台去，在她粉颊上印了无数重重的吻，为她挂上3个花环……

不久我就搬到四披耶路上的公司去住了。有一次又到陈先生的这套公寓串门，却发现斜对面阳台上站的已是一位陌生的圆脸姑娘……

望着夕阳下金光闪闪的湄南河水，脑海中总是响着那首哀婉的歌儿：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

少小离家老大愁

——山区铁路小学生上学一瞥　（报告文学）

□文／王恩豫

当上海、广州、北京等大都市的芸芸众生们为其出国留学或欣喜若狂，或绞尽脑汁的时候，被秦巴山深深藏裹着的铁路工人们，却在为家里的孩子入学而困惑忧虑。

当年，他们的童年充满动荡和艰辛，那时父母们忙着修筑宝成铁路，无暇多顾，加上沿线艰苦的自然环境，「寄宿小学」便是他们上学读书的「天堂」，之后的「十年动乱」，却让他们在「天堂」里酿就的理想和梦幻，全部化为泡影。入路后，面对着默默青山，静静的嘉陵江，他们全身心地工作，慢慢地，他们洞熟了外面世界的「精彩」。于是，理想的「死灰」复燃了。几乎是一夜之间，这些被人们称为「第二代宝成路」的年轻父母们，把那复燃的「火种」投置在孩子身上。然而，谈何容易！铁路依旧，青山常在，风貌却今非昔比了。当年的「寄宿小学」房屋尚在，只是已让风雨侵蚀得斑斑驳驳，即便它们仍能「构筑」理想的「殿堂」，但在那些父母眼里，它终归属低档次、低品位。他们要让自己的「梦」追赶外面世界的「精彩」潮流！

何谓潮流？一流的教育。在他们有些人眼里，教学质量的品位和城市声名成正比，于是，西安、郑州、宝鸡……，便是外面世界的「精彩」潮流！

红卫坝，一个五等小站，若不是往来的列车惊起一阵声音，它终日被沉静所笼罩。而蔡妹已在此送走了十个春秋。开始，她心安理得，可终归耐不住同伴们的离走，变「躁」了，怨天、怨地、怨丈夫：没本事。丈夫受不了，离她而去。孑然一身的她，把「躁」心全部给了八岁的儿子，发誓一定要让他出人头地，不惜重金给儿子在宝鸡寻到一所寄宿学校。只是每到星期六，家在宝鸡的孩子被家人接走，唯独她——绝望中寻到一条生路：嫁给一个在市建国路做服装生意的小老板。梦想成真！她不「躁」了，至于那位老板在外时常彻夜不归，她鞭长莫及。每次和站区职工们谈起孩子上学一事，她总是振振有词：「他哪怕考十分，也比在这里考一百分强！」

小雷是两当工务部门的记工员，今年二十八岁，爱人也在当地工作，目前正怀孕在身。在西安、宝鸡等地，他有亲戚，而且大都身居要职。所以，他充满了自信和骄傲：「孩子一满两岁，我就送去！」

相比之下，白水江车站的华锋说话就底气不足。本来，当地有所小学校，据说质量和设施相当不错。可是，华锋却舍近求远，托人给女儿在西安找到一家学校，价高且不说，孩子在何处落脚？谁来监管？难住了他。有人讥嘲他自找苦吃，他说：「同一颗树上的苹果，站在桌子上摘就比站在地上快！西安是桌子，咱这——」摇摇头，一脸无奈。

80年代初，当下乡「知青」返城的浪潮正风起云涌时，一个「顶替接班」的浪潮也随之掀起；被大山和嘉陵江所困的宝成路亦是浪高潮涌。父辈，这些「第一代宝成路」们，那时正值年富力强，面对回归后终日无所事事的儿女，只得忍痛提早告别心爱的铁路。于是，其子女们成为一代新铁路工人，足迹遍布宝成铁路、阳安铁路、襄渝铁路……

而「小皇帝」的降生则来得太快，也显得太晚——外面世界开始「精彩」了。身处沿线小站的年轻父母们，受不住其冲击和诱惑，情愿自己寂寞，也绝不愿让其孩子寂寞，只是怎样去领略呢？又是父辈们关键时刻做出第二次牺牲：用自己「夕阳」的灿烂映照「小皇帝」。对此，他们不仅轻车熟路，而且还更上一层楼，不惜精力，给予极大的关怀和照顾；当年花一分钱给孩子买一颗糖尚要皱眉头，现在花上百元也不可惜。至于「智力开发」他们无能为力，只能放任自流。

略阳，一个倚着宝成铁路的小县城，八年前名不见经传，可随着襄渝铁路、阳安铁路，「小皇帝」们涌入、回归，一时间，在那些山区小站年轻的父母眼里，竟成为「文化和误乐」的中心。而位居车站广场一侧的铁路幼儿园和小学校，则是一些「老」宝成路们新的寄托之地。每当日去西山，该地的大门口便围满了他们，接外孙，接孙子，接……。一个个是那么热忱，那么兴奋，委实让人叹为观止。

老赵退休前是一名很出色的火车司机，而今又开上车，却不是火车，是接外孙和孙子上学的人力三轮车。开始去幼儿园，而后学前班，风风雨雨，从不停顿。每每，外孙坐外，孙子坐里，同样的衣着，同样的笑脸，老赵更是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忽一日，人们不见他们了，又几天，蹬车者换了人，是老赵远在襄渝铁路线工作的儿子。原来，老赵已离世。依着儿子的意思，俩「小皇帝」往后上学步行走，可是，俩「小皇帝」竟死活不肯，非车送车接不可！无奈，儿子只得顺从。眼瞅春假期快至，以后咋办，儿子愁绪满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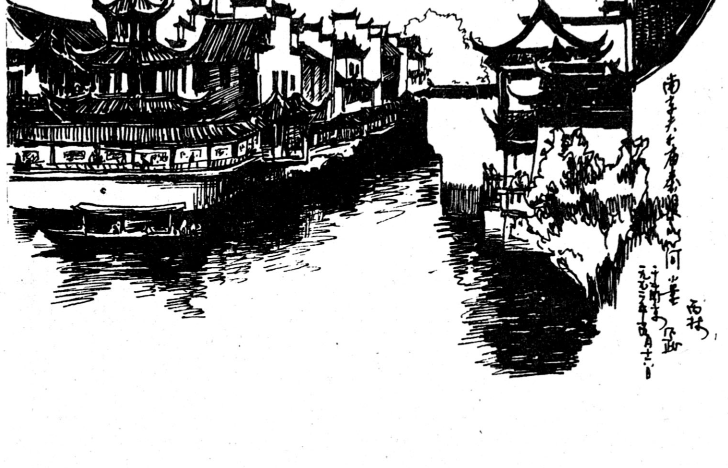
随着社会的进步，爱的情感日臻完美，多姿多彩。今天，「第二代宝成路」们奉献给「小皇帝」的爱，仅靠赤诚、无私、坦荡等词已远远不够。爱出个性，爱出火爆……既让「父辈」们惊诧，也让路外的年轻父母们自叹不如。面对市场上五花八门的所谓「智力」开发用品，他们几乎发疯般地不惜重金想方设法买来，至于其它诸如服装、玩具，更是倾尽财力以予供给。而对自己则是节省再节省，平时买菜瞅最低价……

矛盾吗？太矛盾了。且不说那些用品尚待验证，单讲其心态：一些人不觉间陷入虚荣和攀比的泥潭之中。由于其地处山区，加之早年又没喝多少墨水，所以，他们全部希望只得寄托给学校，可学校除了文字和基本的道德规范，还能多给些什么呢？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困惑和忧虑！

眼下，横现河车站值班员李杰正陷入困境难以自拔。前几年，「钢琴热」时，他花300多元给女儿倩倩买了一台国产电子琴，年仅六岁便送到县文化馆举办的电子琴班学习。当时，他并没抱多大希望，不想倩倩竟很具天赋。这下，李杰热血沸腾了，星期天一大早骑自行车往县城送，往返二十多里，从不叫苦喊累。而倩倩也不负父望，省、地、市比赛中多次拿奖。结果，问题也来了，最初买的国产电子琴音质较差，需用日本的替代。李杰毫不犹豫，牺牲了住房集资款。按说，他从此可以舒心，静等人们的掌声和羡慕的目光了；可随着倩倩技艺的日益提高，费用又成他一块心病。当她是初级班，若想向高层次发展，唯有去省城！无疑，那费用将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他愁肠百结，想就此结束，却又顶不住众多老师的惋惜之声。怎么办？他无从所知，只得在心里暗想：也许会有奇迹发生？

奇迹？当初的所为，心里的隐秘之处不也包含有一丝创造奇迹的念头吗？而今骑虎难下，倘若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美梦尚可成真，若从此结束，无疑将是一个恶梦的起头！

对此，双面铺接触网工区的刘超所为，就显得很随意。凭他哥在西安，父母在宝鸡铁路中学教书的优越条件，若去追赶潮流，无疑是佼佼者。他很欣赏一位外国名人说的话：「生命在自由中才能开出鲜艳的花朵。」所以，对其孩子就很宽松。寄托的希望也很实在：「能干什么，就干什么，没必要那么苛刻。当年，我父母对我也曾寄以大希望，当工程师、当作家，结果怎样？失望挺大！其实当工人何尝不好？实在，不用虚伪，烦的时候就喊几声！我觉得人就应该这样，一开始就应该真实。」当说到沿线有些孩子不负父望，学习很好，父母大喜过望时，他对笔者说：「没必要高兴，更不应该到处张扬，孩子学习成绩好，说明他们入了道，高兴之后往往生出更大的企求……也难怪，我们这批人过去失去的实在太多了，总想在孩子身上捞回，能捞来吗？因此，还是安于现状好。总之，一句话，对孩子，对自己，要面对现实，排除虚荣心……」

是的，我们应该面对现实。愿「第二代宝成路」们，还有山外那些条件优越的年轻父母们，永远记住一句话：孩子既是社会的未来，也是父母的未来。未来的歌今天去唱，唯有脚踏实地，那歌才是纯洁、动人……